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何顿著

# 抵抗

# 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抵抗者

何  
顿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抗者/何顿 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54-2282-9

I.抵…

II.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221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mailto: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

I·1751 定价:18.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何顿，原名何斌，男，长沙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中学美术教师，搞过装修等。现为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进入九十年代因中篇小说《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和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而引起文坛注目。现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喜马拉雅山》和《荒芜之旅》及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太阳很好》和《流水年华》多部。

月亮从暗绿的树梢后慢慢升起，天空一片苍绿。战斗停了。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和尸体气味。阵地上横心竖心地躺着一具具日寇和国军官兵尸体。阵地一派寂静，只有树木燃烧发出的哔哔声。坚守在安乡的国民党官兵，已经有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日本兵志在拿下安乡县城，然后直取常德，进而长沙。

这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天。那一年的十一月特别冷，冬天仿佛提前一个月就降临了湘西北一带。平常年不到十二月地上是不结冰的，但那年十月底湘西北一带就开始出现冰冻了。黄抗日和了得志躲在一处炸毁的土坯屋里，注视着前面的日寇。在距他们三四百米的那几幢农舍前，聚集着众多的日本兵。他们叭叭叭

## 出版说明

90年代初,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我社曾经推出了“跨世纪文丛”。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图书陆续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跨世纪文丛”汇集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上,我们还缺少一个能为读者识别的品牌。今年夏天,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这个曾一度代指湖北人却又褒贬不一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

关于“九头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曾写道:“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正字通》云九头鸟:“状如鸛鷖,大者广翼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宋梅尧臣《古风》诗:“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啗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鸛鷖。”但是后来,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们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自然不是对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北人会经商,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无商不奸,与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亏。所以,九头鸟之于湖北人,实际上是具

有一定贬意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

当然,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九头鸟”系列,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而是我们认为“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复合型人才吗?而“广翼文许”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如12万字左右篇幅的作品,来冠之以“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经过商量,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准备像“跨世纪文丛”一样,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总题用“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小说。当然,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不能仅看篇幅长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我们既要重视题材的多样性,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否则,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

我们十分明白,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这套书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像我社的“跨世纪文丛”一样,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 一首迟来的挽歌（代序）

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好好地认识，真是让人感叹和唏嘘。思考片刻，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大概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想那段倒霉和可怕，甚至是令人说起来都齿冷的历史吧。而如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愈来愈被大众所忽略，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想的都是未来，想的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而过好生活当然需要好的东西。拥有好的东西成了中国人及中国年轻人的话题，都着了魔。什么都想占有最好的，好房子、好车、好女人或好男人。这是因伟大的中国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而身为中国人的广大老百姓都想摆脱多年来困扰着我们的贫困，赶到前面去。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没搞“四清”、没搞“反右”，没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没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然生产就发展得比中国快。于是好的电视机他们能生产，好车他们也不断地向中国大陆抛售。而一些人就是贱，以拥有日本电视机日本冰箱日本洗衣机等等而自鸣得意，假如你还拥有一辆日本小车，那屁股都翘上天了。

中国人健忘。

中国人从不痛定思痛。

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很少。

中国人好玩好乐，好一些新鲜事物，好赶时髦。

中国人最大的通病就是没有焦虑感。

这是一个教授朋友与我聊天时说的话。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教室里，老师跟我们讲解南京大屠杀，讲解“九·一八”和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讲国民党军队拒不抗日、节节败退等等。那时候我很困惑。既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了三十万炎黄子孙，为什么炎黄子孙的军队却拒不打击侵略军？为什么不拼死抵抗而节节败退呢？后来长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不是不抗日而是日本军队太厉害了，装备太好了，想打也打不赢。小时候还听说日本兵曾四次进攻长沙，有三次被长沙守军击退，第四次由于张德能将军的轻敌和指挥失误，致使日本侵略军攻克长沙城。那是一九四四年，即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前一年。后来下乡当知青，于农村里听说日本兵到过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并在那个村子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多名。农民于歇工时讲的日本鬼子进入村子的故事里，有两个细节留在我心里多少年了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一个是说日本兵不呷死猪肉。他们捉住猪捆起，割下活猪的后腿肉烧着吃；另一个细节是说日本兵强奸了妇女后，还割下了那名妇女的一对乳房扔在地上。在我下乡的那个村子里有一名抗日英雄。村里有人告诉我，说他杀死过两名日本兵。那名抗日英雄是个农民，我下乡时他五十多岁，长得黑黑的，与其他农民没什么两样，只是感觉上很结实。村里人说他有武功。那时候我常常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他，觉得他不是电影里日本兵嘴里说的“东亚病夫”，更不是令我们一百个鄙夷的汉奸。

后来长大了，结了婚，去常德看岳父岳母。我岳父跟我说及了常德会战。我最开始晓得国民党五十七师和余程万师长，是从

我岳父嘴里。岳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说起国民党五十七师时脸上居然多了一抹崇敬。岳父告诉我，一个师，五千名国民党官兵把几万日本兵打得很恼火。日本兵想在三天内消灭这个师，结果用了十九天，而且还动用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和毒气弹。我当时就想这是民族的东西了。这是民族的东西——一种精髓或者叫做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这五千名官兵，致使他们顽强抵抗，将生命献给了家乡这片热土。

衡阳保卫战我八十年代初就晓得，但那只是晓得而已，并没深究。

我起心写《抵抗者》这部抗战小说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一九八三年，写了个中篇，写得匆忙，所以就没发表。几年后，八十年代末期时我于一个偶然的机，在天心阁茶室里认识了一位前国民党老兵，他参加过著名的衡阳保卫战，而他参战时只有十六岁，是长沙长郡中学的中学生。他告诉我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开春时大多入了伍，为的是打击来犯的日本侵略军。这位老兵说，一入伍部队就开赴衡阳跟日本鬼子干。当时我很感动，又坐到桌前重写《抵抗者》，但写完后仍然觉得是意犹未尽，这是我心里没底。隔了些年，又认识了一些前国民党老兵的后裔，继而也认识了那些老战士。那些老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结：恨日本人。他们讨厌日本人，讨厌日本货，阻止家里人买日本电器。我有一个朋友买了台东芝冰箱，他的父亲得知东芝冰箱是日本货后，就在家里面东甩西，与他过不去，最后他只好换了台国产中意冰箱。这些事情于这几年里常常于有意无意中涌入我的脑海，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脑壁，致使脑海里一片呐喊声，甚至枪声炮声也涌入了我的脑海中，最后我终于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写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抵抗者》。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也许并非我想象的

那么好。我要强调一点是，我写它时，把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末的湖南南县和汉寿的厂密大屠杀，推后了几个月，这是为了便于集中起来一并叙述。厂密大屠杀是很残忍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境内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杀死了四五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写不足以表述我对日本侵略军的憎恨。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密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我那久违了的眼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使写作中的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且郁闷不已。另外，为了写好这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小说，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文学才能，为此把结构和时间都有意打乱，这是我借用了现代派手法书写。因为假如按时间顺序写的话，也许这部小说会写得很长很长，而写得过长，一是自己很累，其次读者读起来也会很累。如今这年月，人心都很浮躁，不愿意也没时间啃读很长的小说，读者有权利阅读，也有权利放弃阅读。为了两便，为了不至于读者们于阅读中半途而废，就写成了这样。希望第一次读我的书的读者和我的老读者们喜欢。

作者

2001年12月

---

我老爹有八十岁了。他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一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个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像）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 圣善夜/神子爱 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

我老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

我一直就想以我老爹为原形写一篇小说。这个思想起始于一九八三年，那时我刚开始学习写作，常常在家里瞎编，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是东西。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他是一位文字编辑，姓李，当时五十多岁，一生很坎坷。年轻时他才华出众，诗写得棒极了，在解放初期真所谓响当当。我听说那时候诗人是很吃香的。但就在他蒸蒸日上的伊始，厄运选中了他。他太红了，被人妒忌，自然就在劫难逃。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被赶

到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的一个小县城劳动改造。那样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二十年后，当有关部门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时，他已成了一个老实得毫无个性可言的中年人了。他凭着年轻时在《中国青年报》当过编辑的经历，于八十年代初调回了长沙。我于投稿中认识了李老师，就虚心向他求教。他对我早期的文学创作既有批评又有肯定，批评我写的东西没有落在节骨眼上，显然我不太熟悉我写的人的生活。那时候赵本夫写了一篇《卖驴》，我就写了一篇“卖马”，想跟他比一比。然而我并不知道马，在我生长的黄家镇并没马，后来也只在动物园里见过几次毛色灰黑的马，自然就写不进去。那时候蒋子龙写了篇《赤橙黄绿青蓝紫》，且获了全国中篇小说大奖。我就模仿着写了篇类似的东西，但我没当过工人，对工厂也不甚了解，我想象的车间只能生产毛衣，而且只能是针织的，因为我对机器也不了解，自然也写不进去。李老师劝我写写自己最熟悉的人。

我记得那次谈话是这样的：

你养过马吗？李老师说。

我笑呵呵地摇摇头：没养过。

那你不懂马啊。

我惭愧道：不懂。

李老师叹口气：你当过毛衣厂的工人？

没当过。我说。

李老师拧着眉头说：你这篇小说不像写工人。

我又惭愧了：我也觉得不像样。

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不写点自己熟悉的东西呢？

熟悉的东西？

李老师进一步语重心长地启发我道：什么东西只有自己十分熟悉，才能写进去。不熟悉，写出来的东西就干巴巴的，文笔再

好也不生动啊。

我当时就想到了写我老爹。

一九八三年时我写了一个六万字的小说，取名《抵抗者》，写我老爹他们打日本人。但由于自己写作经验不足，写出来后没有发表。于是我把它锁在抽屉里，后来又索性转移到箱子里，从此不再问津。一压就是十六年。

然而我一直没忘记该小说。这十六年里，我搬了四次家，从一处地方搬到另一处地方，从小点的房子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从这个单位搬到那个单位。一搬家就总是想精兵简政，不想要的东西你绝不会带走。在四次搬家中我烧掉了很多废稿，比如“卖马”；又比如类似“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稿子都一一化为了灰烬。但我一直保留着《抵抗者》，我也不晓得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舍不得烧毁它。直到去年再次搬家，当我捧起厚厚一叠稿子翻阅时，我脑海中产生了新的构思，决定重写《抵抗者》。这当然是一九九九年的事。

重写该小说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念头。念头在我脑海里产生过好几次。例如在九十年代初就产生过，打算重新写它。在九十年代中期还产生过一次。我对自己说：我还有一本书没写的。那时我就向我的朋友宣布我要写一本名叫《抵抗者》的书，是写一本抗战小说，取材于我老爹的故事。后来一些朋友就问我那部抗战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我说还没写。当时我在写一些别的小说，于是重写这本书的欲望一直被压着，直压到去年才又开始启动。

关于《抵抗者》这部书，我还想聊几句。它在八三年时是一个中篇，六万字。我于一九八九年时重写了一遍，仍是一个中篇，但发展成了八万字。十年后我再次写它，它当然就成了一部

长篇。倘若当年发表了，这部书就永远是中篇，因为当年没写好它，所以十六年后它将被我写成长篇。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因为有整整十六年的思考，它不是长篇也是长篇了。我重写它就不光是写抗日战争了。我要写我老爹的一生。我老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十天后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半年后再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的破晓，他与他的弟兄在团长的指示下一并向日本侵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我老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里，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却没有打下来的游击队，路经黄家镇时顺便解放了这个镇。于是我老爹再次获得自由。我老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却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老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老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着。

我在小说开篇之即，还得交代几句，以免只有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生气。我要说的是，本小说与众多传统小说不同，时间是打乱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一不小心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我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你就不难理清头绪。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

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

我老爹于去年满了八十岁，现在正是往八十一岁的路上跑，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然还活着。我老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正好是国际儿童节，全世界的儿童正在欢庆节日，我大哥——一个从小就以聪明和好学著称的人出生了。我老爹就是由于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捉拿的。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级。但是在伟大的北京，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据我嫂子说我大哥仍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我姐共一个母亲，我姐比我大三岁，如今是省医科大学附二医院的医生，今年四十四岁。

我和我姐都是我老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刚满十四岁。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再教育。当时我老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面对着我母亲那肥胖的尸体（河水泡成这样的），他奇怪地瞪大眼睛说：她是谁？干吗孤零零地睡在地上？

我记得老爹在神经错乱的情况下，居然用了孤零零一词。我说：爸爸，她是妈妈呀。

老爹就嘻开宽扁大嘴笑，好像是不相信的样子说：哪个的妈妈？我妈妈早作古了。

我解释说：她是我妈妈呀。

老爹就仔细盯了眼尸体，然后很害怕地跑开了，躲到房间里嘀咕说日本鬼子来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了一个信息，我老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老爹是国民党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走进来，忙尖叫：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来了。弄得造反派们大为恼火，感到受了我老爹的侮辱，就用脚踢我老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你说？但是无济于事，我老爹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以为我老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就好像《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一样。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小说，都晓得华子良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老爹放了，因为他吃自己的屎。他们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老爹连猪狗都不如了。

那是一九六九年，我老爹还没满五十一。

我老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他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我老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老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里，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好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老爹送回了南